如果精神分析是瘟疫　蔡榮裕

寫在《生命荒涼所在，還有什麼/可撫慰與無可撫慰的分析》出版前夕

感謝玉華、念儒、瑞君、秋茜和依盈的序文。他們的文字豐富了這本書，我也相信，這些文字都會是精神分析在未來台灣的重要資產。

直到此刻，全球面對著病毒的侵襲，仍是一個待觀察的命題，當處在2019-nCOV（武漢肺炎）蔓延的紅潮裡，祝福台灣，台灣也值得被祝福。

蘇姍桑塔格在《疾病的隱喻》裡是要鬆開隱喻，尤其是帶有歧視的想像，不再附著在某些疾病上，她觀察的是肺結核和愛滋病等疾病，在社會文化脈絡裡所隱含的心理，甚至是廣義政治的意涵。尤其是其中所呈現的歧視，這是文化層面的觀察，但是對於以精神分析深度心理學，做為志業的專業職人我們來說，這些現象只是一扇窗戶，愈是不可思議的存在，愈意味著那裡有著人性裡，待了解和想像的心理場域。不過我想的是，如果這是人類歷史裡屢見不鮮的情況，意味著是有心理或人性的「需要」，並不是要鼓勵的意思，而是如果這是不可避免，甚至是需要的，那麼我們至少得好好正視它們，關於隱喻在人之間的重要性。

卡謬的小說《瘟疫》（有人譯為《鼠疫》），而馬奎斯的小說《愛在瘟疫蔓延時》，其中的瘟疫是指霍亂，這兩者是細菌，而2003 SARS和目前正掀開的武漢肺炎則是濾過病毒，但社會都以「瘟疫」來稱呼它們。至於薩拉馬戈的小說《盲目》，正是一場世紀大瘟疫，染病的人都失明了，但是找不到解藥，是具體的盲目，卻是抽象的隱喻病源來自人性。

「瘟疫」這語詞，成了語言的重災區。生物學上不同的難治之傳染病，都曾被叫做「瘟疫」，好像它是萬惡之疾，最難以捉摸的

所在，或者是最深的恐懼所在。這三本小說也都在描繪，瘟疫做為恐懼的所在，是另有無法捉摸的撕裂人性，也許是人性裡最晦暗苦澀，無法有施力點的所在，只能等待它來臨的恐懼。就算我們有了自戀、分裂機制、否認機制和認同攻擊者等術語，顯然它們仍是不足的，仍難以帶來更多的思考，進而讓恐懼得以緩解。

當佛洛伊德去美國宣揚精神分析時，卻說他是帶去了瘟疫，也許他內心深處是相信，精神分析的理論裡，具有某種如同瘟疫般讓人恐懼，而且無可撫慰的素材？佛洛伊德在象徵上就是走進去，不想要空手而歸，但是能夠在這些「無以名之的恐懼」裡帶出什麼嗎？

另在瘟疫期間，個體和群體的認同關係，是值得觀察的動態過程。

佛洛伊德在《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》（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, 1921）裡，想要理解一個重要現象，如果個體欲望滿足的自由被如此強調，何以會有最古老的兩個團體存在，一是軍隊，二是教會。因為團體的存在，具有約束個體的功能，何以個體願意形成團體，來約束自己欲望的完全滿足呢？

在目前防疫體系的指揮下，「台澎金馬防疫共同體」的建構更是堅固，在「經濟共同體」、「教育共同體」、「社會共同體」、和「政治共同體」等認同的建構裡，「防疫共同體」的建構過程，是更生死交關，也更有患難與共，以及求平安的心理基礎。

對比經濟共同體的求好求有錢，政治共同體的求民主求自由，而防疫共同體是另一個相當重要的共同體的建構，對於未來會有更具體的影響，在目前不需要深奧的理論做為出發，雖然防疫指揮中心的工作，是高度的科學和心理戰。但值得後續深度來了解它的深奧，有的是大家生死與共，一如大家熟知的防疫視同作戰。

如果精神分析如佛洛伊德說的，他在去美國的輪船上對同伴說，是帶瘟疫去美國。那麼精神分析需要什麼公共道德嗎？如同大家在防範武漢肺炎的過程裡，所強調的人和人之間的互助，公共道

德和衛生習慣嗎？這是比喻，但值得一想。這是精神分析被排斥的原因嗎？除了佛洛伊德強調的，因為精神分析觸及了人的自戀，和直指了人性裡難以被接受的內容，使得精神分析變成被他人排斥的對象，一如武漢肺炎的過程裡，引發了有人排斥他人的現象。

如何確認精神分析做為一種瘟疫，是指什麼呢？如果精神分析仍要繼續發展，也許值得思索的是，有影響但不是讓宿主滅亡，這樣的分寸如何節制呢？也許這是佛洛伊德提出，分析師要節制欲望的潛在理由之一嗎？

精神分析並非整個是瘟疫，但是它可能擁有瘟疫的某些特性，如同它帶有政治、文學、藝術和宗教等的某些特質。這麼是件很辛苦的想像，冒犯著目前大家極力把瘟疫擋在外頭的動力，也許要努力思索精神分析的發展模樣，做為了解瘟疫的某種方式，或者相反過來，透過了解瘟疫引發人性的相關細節，來推想精神分析的種種。

祝大家平安，也往廢人心理學第二部《廢人與曖昧》邁進。（2020.02.10）

編按：此篇原打算作為2020年3月1日出版【廢人心理學三部曲】第一部《廢人與荒涼》之跋，因作業不及，放上此處以饗讀者。